

广义经济学原理

政治经济学改革

韩宗琪

农业经济技术

文集编辑部

中国原子出版社

韩宗琪

农业经济技术文集编辑部

中国财政出版社

广义经济学原理

政治经济学改革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经济的实际、特别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为基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作为框架，吸取现代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40年及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经验，也借鉴其中的失误和教训。对当前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经济实际的新见解。适用作政治经济学及理论学习的教学用书，对广大经济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广义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改革

农业经济技术文集编辑部

韩宗琪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广东省新会县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8.5

字数190千字

1990年3月北京第1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50—0611—8/F·278

定价：3.50元

序

《马克思主义广义经济学原理》这本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价值论，探讨我国4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为框架，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现代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做了理论上概括的尝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者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作为经济学原理的教学材料，在十多期各类经济干部学习班讲授，先后听讲人数过千人，近两三年，作者又以本书初稿或《大纲》反复征求广州地区部分大专院校和理论界人士和部分外省市学术界人士的意见，对本书作了反复的补充和修改。

我历来主张：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可以有多种体系的著作和教材，经过一段时间的商榷、探索、争鸣，逐渐地求得一致。这正是学术和理论繁荣的重要途径和标志。

目前许多学科的理论体系，包括一些新学科，它们的体系还不成熟，或者由于实践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原来的体系不够完备，需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只要总的指导思想相同——即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具体体系是可以多样化的。这些体系，有的以原有的

体系为基础，有的创立一种新的体系，有的以马克思主义某本著作作为基本，结合新的情况，补充新的理论观点，等等。把不同的体系写成著作，进行讨论比较，择优综合，以便形成一个为大家比较一致赞同的体系。在讨论不同体系时，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不要随便扣帽子。将自己的看成唯一正确，其他一切都不行。韩宗琪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广义经济原理》正是众多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体系，它的特点是以《资本论》的体系为基本线索，结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有关内容而写成的。我认为这本书的体系和内容，是有益的尝试。为此，我乐以为序。至于这本书的体系和理论观点，是否站得住，能否得到共同认可，由广大读者鉴定。

张江明

（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

序 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以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指导思想，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从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发展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但与此同时，众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对于现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按历史顺序把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机械地结合起来的体系，对于现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理论内容上的前后重复和政策性论述太多感到不满意。很多同志在思索，怎样才能对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开拓和创新？在这方面，韩宗琪同志率先向前走了一步。《广义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改革》一书，就是他为争取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两方面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种大胆的尝试。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毫无疑问，要创建符合现代经济的实际，特别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要探索和提出一些新的学术观点，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因此，我们也不难看到，在《广义经济

学原理——政治经济学改革》一书中，存在着不成熟和缺点等情况，是难以避免的。我认为，我们应当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容许大家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各种探索性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观点，通过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学术观点的比较、讨论和交流，达到繁荣经济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

李鸿昌（广东商学院院长）

前 言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但自1953年苏联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后，一些国家就将这本教科书的体系，当做经济理论的最高圭臬，并把它固定化和僵化起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本书日益脱离当代经济的实际，特别脱离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实际。

这种情况，不仅对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也一定程度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声誉。今天，对教科书体系的经济理论，人人都说要改革。但是，如何改革？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为多数人所接受的途径。

在1952年以前，即教科书没有出版以前，社会主义者从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主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或其通俗读物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经济学说。当然，当时也存在许多缺点、甚至错误。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在人民群众中，在理论界，特别在社会主义者中，威望是很高的。

1953年以后，社会主义者也主要通过《资本论》为主的一系列经典著作，及其通俗读物（教科书的上半部在把经典

著作通俗化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理论和立场、方法，造就了现存的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

这样的历史事实，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这说明：社会主义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主要并不是通过教科书的系统的。总结这个很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所以，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的正确方向，就是应该跳出教科书框架，直接回到《资本论》的立场、方法和理论体系，再吸收自《资本论》问世以后经济实践和经济科学的新成果，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成果，形成符合现代经济实际，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实际的经济理论体系。

当然，这条道路是十分困难的，也是有很大风险的。这种困难和风险，不仅是理论上的，特别是来自人们的偏见。

从理论上说，《资本论》问世已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中，经济上出现了这么多巨大的新事物、新成果，现在，要把这些成果以《资本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抽象、概括起来，把它与《资本论》相融合，并加以发展，这个工程的艰巨，可想而知；其间可能出现的差错，及可能遇到的风险，更是无法想象。

但是，这种风险，更大是来自人们的习惯势力形成的偏见。

人们经过教科书体系30多年来的薰陶，一方面既深知其非，痛感非改不可；但另一方面又习惯成自然，真正面临改革，总对新的探索看不顺眼；弄不好甚至还给戴上顶什么

“帽子”。实际上这也很难怪，这么一个巨大的全新工程，要想一次完善，相反是十分奇怪的。

如果人们也能以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待新的探索。不管新的体系有多少毛病，相对总是比较符合现代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实际；它总还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从这点说，应该说总还是比旧的僵化的体系进了一步，更比索性放弃马克思主义系统的经济学说阵地要好一些。

作者正是抱着这种态度，尝试走出探索的一步。

二

旧的教科书体系的根本缺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从当代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严重脱离现代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

当前，我们正处于从20世纪80年代向21世纪迈进的时代。当代经济，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经济学做出说明。但传统教科书并没有从这些现实出发，回答当代经济的重大问题。

传统教科书一般都分为三大段。即资本主义部分、帝国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少数教科书在三大段前还有一个前资本主义部分的小段，成为三段半。

前资本主义部分那一小段，一般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此，近年来，多数书已弃而不用。

资本主义那一段，实际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摘要。

帝国主义一段，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摘编。

各书由于摘编者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差别，各有优劣。但就这些章节本身而言，都没有大错。这两部分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书是现代出版的经济科学书，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回答现代经济中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说史。

如果只摘编名著，而不与现实经济问题挂钩，不阐述这些名著上的论断，怎样说明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以及那些论点，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那么，大段名著摘编，实际就成了无的放矢。

有人说，学习名著是有很大大好处的。这个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但那样的书，应正名为“名著摘编”，而不应叫经济学（或现在习惯通称的政治经济学）。

为大家营病最多的是第三大段——社会主义部分。这部分因无本本可依，各书就把各自国家现行经济政策归一归堆，或者再把它“抽象化”一下，称之为“规律”。因此，这部分实际成了各自国家的经济政策彙编或“经济规律”彙编。

这部分也改变最多。各个国家政策大变一次，这部分也跟着大改一次；政策小变一次，这部分也跟着小修一次。总的体系总是定不下来。至于书中所述，有许多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政策注释及彙编，也就应正名为政策注释或彙编，而也不必叫经济学（或通称的政治经济学）。

所以，总的说来，传统教科书是唯书、唯上的，而不是唯实的。

二、违背时代的要求

经济是讲发展生产力的。当代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经济建设和发展，应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资本论》讲的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的更主要是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和必然灭亡；从而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正名、壮胆、指明道路。这在马克思、列宁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是抓住了当时经济学的时代要求。如果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抓住这个时代要求，而主要讲当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那么，马克思、列宁就不是伟大的革命家，而就成了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谋士。

但是，今天的经济学，在运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论断时，就应根据时代的不同，主要取其说明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原理；而不应仍只把批判作为中心。如果只是照搬原文，不区分时代的不同，那就是典型的胶柱鼓瑟，刻舟求剑。

问题最多的仍是社会主义部分。在“左”倾思想统治时期，这部分的中心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经济范畴都与资本主义本身划等号，都要批判，要大破，要打倒，要消灭；社会主义经济一切要反其道而行之。从此出发，臆造出一批与客观经济实际相违背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一切，在“四人帮”那里，达到了顶点。

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及近年苏、东国家，对这些臆造的所谓规律，已辨明剔除了一批，但还不彻底，有

待一代的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继续努力。

三、旧教科书的体系，是从某种先验的、固定的模式出发的静态的形式体系，违反了经济发展是客观存在的、动态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相一致的辩证关系的现实

这点在社会主义部分最明显。传统教科书把前社会主义部分经济只当做历史而描述，并把它当做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面。社会主义部分则从一个先验的模式——某种固定的所有制形式作为起点，然而再从模式的内部作横剖面的描述，而且把生产关系只归结为几个按顺序递进的模式，而不认为是根据生产力状况而动态发展的活的经济存在。

对比《资本论》体系，则显然不同。《资本论》从最简单的经济细胞——商品作为起点，抽象掉社会制度的区别，逐步历史地、逻辑地发展，直到资本的增值和再生产的总过程，形成经济发展活的全貌。

所以，传统教科书体系，实际已走入了注释训诂的经院学派的死胡同。

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那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列宁这里所说的文化，显然是广义的，经济学当然包括在内。

马克思说：“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②

^①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8页。

传统教科书的三大段体系，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前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割裂开来；把前社会主义的一切，看成是只需批判、破坏，而不需吸收的历史罪恶。认为与它们只有对立，没有同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完全从空中产出，是从破中立。

这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和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的结合。

这就是传统教科书体系缺陷的根本所在。

三

所以，我们理应回到《资本论》的体系，即把人类的经济看成是统一的，当代经济是历史的经济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而来的，是以前社会主义经济各阶段作为自己的发展阶段的；就象《资本论》把前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一样。《资本论》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外，另列前资本主义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学。所以，现代经济学，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分为几大段。

我们今天需要的经济学，是要从现实的经济情况和时代要求出发，以《资本论》作为基础，再把《资本论》问世以后的新情况、新经验、新知识，增加和融合到《资本论》体系中来，把《资本论》发展成为今天的现实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理论体系，而把前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作为它的发展阶段。这样的经济学，才能用以说明和指导今天和今后的经济实践。

回到《资本论》，发展经济学，探索求同异，中心为建

设。这就是总的结论。

回到《资本论》，是指经济学应摒弃从某些先验的、固定的模式出发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回复到《资本论》的体系——即以经济实际的历史的发展与逻辑的发展统一的动态系统，作为经济学的体系；

发展经济学，是指应吸收从《资本论》问世以来，经济实际中所创造出来的全部新知识，从而把截至19世纪为止的、空前的最伟大的经济学理论著作——《资本论》，发展为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经济学理论。

探索求同异：即指经济学按学科的要求，理应抽象出一切社会形态中经济发展中共性的规律和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特性，也只有认识共性，才能更深刻地分辨个性。这也就是广义的经济学，是恩格斯早已提出的任务。

中心为建设，这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当然也不要忘掉对旧制度的批判，但不能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四句话，即是本书的主线。

四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40年来，取得很大成就。有很丰富的经验，特别表现在1949年到1957年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2年到1965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但也有某些失误，这主要集中在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时期，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及以后延续两年多的“洋跃进”时期，以及近三四年的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较严重的时

期。前两时期主要是仍带着空想社会主义成分的统制经济的“左”的错误；这时期的错误的理论，即以上述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作为代表；后一时期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错误，其主要理论根据，即当前一些流行的西方经济学。但是截到目前为止，在理论上，对正确的仍肯定不够，认为这些经验仅只是为应付当时经济恢复、经济混乱、经济困难等特殊情况的权宜之计。而没有认识到，这些经验和做法，正是在马列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的真正符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虽然当时还没有这样概括，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对失误也认识不深，一般只是就事论事地评价，而没有认识到，在理论上，正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基本经济原理，从“本本”出发（前两阶段是从“教科书”的本本，后一阶段是从西方经济学的本本），而不是从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由于在理论上认识不深，因此在经济困难时，虽也曾不得不拿起正确的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武器，从而克服了困难，经济得到了顺利发展；而一到经济比较正常和顺利的时候，又不自觉地丢掉了正确的武器，相反去捡起那些“左”的或右的不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国情的“本本”，使经济重又陷入困境。如此一再反复。

证之国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有类似状况。国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既有正确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仅理论上符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践上经济也发展迅速和顺利；然而也有失误或错误的军事共产主义和斯大林的统制经济等“左”的做法，使经济发展迟缓或停滞，以及近年来在有

些国家经济改革中，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使经济宏观失控，造成经济甚至政治混乱状况的右的错误。但对此状况，理论上也一直认识不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直被认做是暂时的退却，而实践证明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左”的和右的做法，特别是统制经济的做法，和某些国家经济宏观失控的做法，相反却被认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统，和评价为改革必由之路。因此在思想和经济实践中，形成混乱。

40年和70年是个不短的历史时期。理应对这40年、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正确的马列主义的经验和做法，和不正确的非马列主义的失误和教训，做出系统的分析和评述。以为今后经济工作借鉴。本书各章节，力图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五

以上想法，早在60年代初，当时为了在自己思想中回答现实经济中碰到的问题，就开始产生。当时，也曾将其中某些问题，整理成文。但在与某杂志联系修改中，开始了“十年动乱”。鉴于形势，烧毁了当时已写的全部文稿。因此在“动乱”中，在这个问题上幸免于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担任某些经济工作，因此又把上述思想拿出来，并进一步探索，积累。从1979年开始，因为工作需要，曾以此内容先后在十多期在职干部培训班试讲，听讲人数前后超过一千多人次，讲稿大纲先后大改7次。听讲人员共同反映，较之传统教科书比较符合实际，较能说明现实经济问题。